

李仲勉

著作集

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

中华书局

卷之三

卷之三

岑仲勉著作集

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岑仲勉著. -北京:中华书局,
1981.2(2004重印)

(岑仲勉著作集)

ISBN 7-101-04184-1

I. 汉… II. 岑… III. 汉书 - 校勘 IV. K234.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4004 号

责任编辑: 张继海

**岑仲勉著作集
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89×1194 毫米 1/32·19% 印张·456 千字

1981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3601~5600 册 定价: 50.00 元

ISBN 7-101-04184-1/K·1763

岑仲勉著作集出版说明

岑仲勉先生(1886—1961)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历史学研究,在隋唐史、先秦史、古代文献学、中西交通和民族关系、史地考证等方面,均卓有建树,为国内外史学界所推重。

岑仲勉先生一生著述丰富,已刊专著近二十种,另发表论文近二百篇,其中一部分论文已结集出版。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华书局先后出版岑仲勉先生著作十余种,及时向学术界推介岑仲勉先生的研究成果,有效地推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随着时光的流逝,岑仲勉先生的多数论著今天已经很难觅得,学者购求极为不易。为适应学术界的需要,我们决定将岑仲勉先生的旧椠新刊一并汇集起来,以“岑仲勉著作集”的名义集中予以重印。“岑仲勉著作集”将尽可能收录岑仲勉先生的全部已刊著作,并将未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的部分论文及未刊稿另编为《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出版,使之成为岑仲勉先生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为此我们还特别就“岑仲勉著作集”所收各书编写了《岑仲勉著作集论文及札记篇目索引》,附于《续集》之末,以便读者检读。

岑仲勉先生的著作出版时间跨度大,版式及标点方式各异,所涉及的学科范围十分广泛,尤其是西域民族历史和中外史地研究论著中涉及大量专名和音注,如将全部著作统一按要求标注专名,整理重排,则需要专家学者的大力投入,恐短时间内难以面世。如简单地删去专名标注,变换标点,划一格式,表面虽齐整一致,实则势必削弱原著的学术价值,影响读者使用。因此我们在征求学术界同仁的意见之后,决定除少数短篇著作外,均采用原版影印的方

式以应急需，已发现的部分明显文字错讹则予以改正。岑仲勉先生全集的重编整理工作非匆忙间所能办，当俟来日从容进行。

“岑仲勉著作集”目录及所据版本如下：

一、《两周文史论丛》（外一种：《西周社会制度问题》，新知识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版；

二、《隋书求是》，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版；

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陈达超整理，中华书局一九六四年版；

四、《隋唐史》，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

五、《唐人行第录》（外三种：《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二年版；

六、《唐史余瀋》（外一种：《府兵制度研究》，据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重排），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〇年版；

七、《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登科记考订补》），陈达超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八、《金石论丛》，陈达超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九、《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

十、《突厥集史》，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版（重印本有较多修订）；

十一、《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版；

十二、《中外史地考证》（外一种：《佛游天竺记考释》，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版重新标点排版），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

十三、《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十四、《岑仲勉史学论文集》，陈达超整理，中华书局一九九〇年版；

十五、《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陈达超整理，中华书局二〇〇四年第一版。

另外二种：《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已列入我局“新编诸子集成”丛书出版；《元和姓纂四校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一九四八年），经孙望、郁贤皓、陶敏先生整理，与《元和姓纂》原文合并为《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已于一九九四年由我局出版。以上二书暂不列入“岑仲勉著作集”，特予说明。

收入本丛书的部分著作，承蒙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许可据其原版重印，对于他们的鼎力支持，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岑仲勉先生家人和陈达超先生长期对我们的工作予以支持帮助，谨致谢忱。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〇四年二月

绪　　言

《史记·大宛列传》曾记张骞入西域之片断，但对于西域作系统之论述，还以《汉书·西域传》为创始。此《传》可说是后来各史《西域传》之蓝本。人们如能将此《传》弄清楚，其余各史的《西域传》，问题就容易解决。可惜唐以后直至清代中叶，都未有人对全《传》作过研讨。清道光年间大兴徐松始奋起为之，于道里考证（此点似受《西域图志》之启发）尤三致意，可谓知所先务。承之者，如李光廷《汉西域图考》性属概论，丁谦《汉书西域传地理考释》专考今地，然两家均缺外文知识，故收效不大。原夫西域方面，语文复杂，尤其有些是已死的语言，要对证古代名称，单从汉文钻研，自难准确。此后数十年间，对西域史地之研究，仍未见显著之成绩。外人方面，自十八世纪以来，对中亚至新疆一带的史地研究，论著颇多。然彼之目的，以觊觎领土，盗窃古物者居多。且他们理解汉文之功夫，究未到家，因此也不易达到正确之结果。但他们对地名之考订，不无可取之处，亦可供我们参考。

我开始研究本《传》，约在一九三〇年，那时因外文资料缺乏，只构成初稿的轮廓。以后逐渐增补。抗战期间，抽暇进行整理，把它第二次写定。之后一搁十余年，直至解放后去岁秋末，课务稍暇，才又作第三度修正。此次材料补充不多，大体注重地名比定之审查，道里计算之复核，费了大半年时间，此为本书写定之大略。

我编写此书，完全注重于地、里两项，今分别说明之：

（一）地

欲了解古代地名今在何处，必先求出地名之原来或相近之拼音。西域各地，大致通行拼音语言，同一名之汉译，多者可至二三十个。即就拼音文字而言，亦可有几种不同拼写方法。异译既多，令人很难记忆。此亦为一般人不乐于研究外国传之原因。如用拼音方法，不但比较简单易记，甚至字形差异而声音类似的汉译，也易于联系起来，得到解决。试就新疆观之，将新疆要地与《汉书·西域传》等作比定者首推《皇舆西域图志》。那时担任编纂之辈，均为未履关外之文人，原难期其出门合辙。可是他们的考定，成绩还不算太坏。然而基础不稳，方法欠当，总会有问题的。如南道的精绝、扞弥，原在交通线上，现则沦入沙漠；小宛、戎卢、渠勒，原来辟不当道，今则变为羊肠。像这样的情形，他们就无法确考了。最有甚者，他们未能通过实践与史传之结合，遽拟叶尔羌为汉之莎车，殊不知莎车为东汉强国，叶尔羌的历史则只能追溯至元代；《汉·传》明示莎车处帕米尔东缘，而叶尔羌在塞勒库勒东八百里（据《西域水道记》一），城市有兴废，山脉无转移，叶尔羌与莎车言音上无丝毫关系，怎能两者互比？又如七屯城与古屯城之异，伯希和主张“七”为衍文，冯承钧又以“古屯”为正。然自有吐蕃文 *Rtse-thom* 之发见，乃知七屯才是当日土称。又《汉·传》称“劫国治天山东丹渠谷”，明明在山北，王先谦《补注》却把它挪至数千里之外，与坐落在印度库施之迦毕试拉在一起。凡此种种错误，归根结底，都是考地而不追寻语原所致。

（二）里

《汉书·西域传》之里，一为各国去长安之里，二为各国去都护之里。其他各国间里距，为数无几，亦可供考地之根据。《汉书·西域传》记里之误，前人论者不少，今只摘引数段，示其一斑。《西域图志》一七云：“以《汉书》所载两国东去都护治所道里计之，尉头国一千四百一十一里，温宿国二千三百八十里，似尉头转在温宿之

东。今以姑墨国东至都护治所一千二十一里之例推之，温宿国当为一千三百八十里，二千字为一千字之讹。史家记载道里远近，或从边界起数，或从都城起数，或径行，或绕道，广狭各殊，即一书中已有不可合者。”其论颇深切著明，《西域图考》一云：“《汉书》葱岭诸国，里数难据。蒲犁、依耐皆西至无雷五百四十里（西至为东至之讹），鲁鱼亥豕，善会可也。”然界至亦混。《无雷传》云，北与捐毒、西与大月氏接。《难兜传》云，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今无雷在东，月氏在西，休循在北，难兜在南，无雷既逾难兜之北而接月氏，则难兜不得接休循。难兜既截无雷之西而接休循，则无雷不得接月氏。及考《水经注》，始知无雷直接难兜，而班书误也。《汉书·西域传》中里数不合数理的推算，亦往往有之，俱见本书文中，此处不一一列举。总之，如想一一厘正，即使具此魄力，也未必能合乎事实。因途径古今或殊，迂直迥异，改写亦无此必要。现只将《传》中一些单纯性的错误，给以指出或局部修改，以免后来者一误再误。

此外，本书注意研索者，尚有：一、《传》文中方位之错误；二、《传》文中刊刻之错误；三、《传》文中之同名异译；四、对《传》文文义解读中的一些问题，等等。其他各传著录的有关地名考证，亦力求说明其关系。旧说未详之处，如有所知，则加以补充。又本书有关引文，均为节引，其中未用删节号，并请读者留意。

总之，整个西域方面，还有大量发掘和研究工作有待进行。将来对于某些古地名的考订，必会作出更完善的解释。本书主要只在综合各家之说，间有提出一得之见，作为进一步研讨之基础。真正使问题之获得解决，尚有待于学者们之努力也。

一九五九年六月岑仲勉记

目 录

绪言

各传校释

一、婼羌	(1)	二、鄯善	(7)
三、且末	(29)	四、小宛	(40)
五、精绝	(44)	六、戎卢	(51)
七、扞弥	(55)	八、渠勒	(64)
九、于阗	(68)	一〇、皮山身毒附	(84)
一一、乌秅	(97)	一二、西夜	(107)
一三、蒲犁	(125)	一四、依耐	(131)
一五、无雷	(137)	一六、难兜	(146)
一七、罽宾	(150)	一八、乌弋山离犁靬、条 支附	(165)
一九、安息	(204)	二〇、大月氏大夏附	(212)
二一、康居奄蔡、粟弋 附	(237)	二二、大宛驩澨、大 益附	(281)
二三、桃槐	(308)	二四、休循	(310)
二五、捐毒	(318)	二六、莎车	(323)
二七、疏勒	(342)	二八、尉头	(350)
二九、乌孙	(354)	三〇、姑墨	(379)
三一、温宿	(388)	三二、龟兹	(392)
三三、乌垒	(402)	三四、渠犁轮台附	(406)
三五、尉犁	(415)	三六、危须	(419)

三七、焉耆	(424)	三八、乌贪訾离	(432)
三九、卑陆	(437)	四〇、卑陆后	(439)
四一、郁立师	(442)	四二、单桓	(444)
四三、蒲类蒲类泽附	(446)	四四、蒲类后国	(455)
四五、西且弥	(457)	四六、东且弥	(461)
四七、劫	(466)	四八、狐胡	(469)
四九、山国	(473)	五〇、车师前国 金附附	
			(478)
五一、车师后国	(490)	五二、车师都尉国	(506)
五三、车师后城长国呼揭、坚 昆、丁令附	(508)		

传首校释

一、三十六国	(513)	二、天山	(518)
三、玉门关、阳关、蒲 昌海	(536)	四、南北两道	(543)
五、酒泉等四郡	(548)	六、山北六国	(550)
七、人口及兵数	(554)		

附录一：托烈美所述“丝路”考略	(557)
附录二：《西域传》各国及都城名称表	(564)
附录三：《西域传》其他地名表	(567)
附录四：《西域传》各国去长安及去都护里距表	(570)
附录五：甲、西域地名	(573)
乙、西域人名	(589)
附录六：外国作家名字简表	(591)
附录七：征引书目表	(598)

各 传 校 释

一、婼 羌

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胜兵者五百人。西与且末接。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山有铁，自作兵。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

《小宛传》云：“东与婼羌接。”

《戎卢传》云：“东与小宛、南与婼羌、西与渠勒接。”

《渠勒传》云：“东与戎卢、西与婼羌、北与扞弥接。”

《于阗传》云：“南与婼羌接。”

《难兜传》云：“南与婼羌、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

《车师后城长传》云：“又去胡来王唐兜国比大种赤水羌，数相寇，不胜，告急都护。都护但钦不以时救助。唐兜困急，怨钦，东守玉门关。玉门关不内，即将妻子人民千余入降匈奴。”

卷六九《赵充国传》云：“将婼、月氏兵数千人。”

卷七三《韦玄成传》云：“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

校释

甲骨文有“羌”字，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诂》三谓羌本羊之一种，但甲骨文见“北羌”字样，当是羌族。按甲骨文又见“令五族伐羌”，

周金文著录“羌王”。羌之为族，有实物可考。书本则《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竹书纪年》：“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又《周书·牧誓》：“及庸、蜀、羌、髳”，皆是也。《说文》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此婼羌，《汉书·赵充国传》及王充《论衡》均省称曰婼，是婼羌者羌之一种也。

《玉篇》羌，去央切。《切韵》K‘iang。考现在康国旧壤一带，以 kand 名者不一其地（如 Samarkand, Tashkend, Khokand, Tchimkend），kand 即“康”（《切韵》k‘âng）之本语，其初义为“村落”。以余猜之，此种人似较早地舍弃其随逐水草之习惯，而安享定居聚落之生活，因而得 kand 之名称；世化日进，含义亦随以扩大，一衍为“市街”，再衍为“城镇”，原义于是渐湮。“康”与“羌”只音之洪细略异，故谓“羌”之原语，应与中亚之 kand 同出于一宗也。《火教经》(Avesta) 无 kand 而有 Kanha，义为 eines Lands; die Burg von Kanha, Kangdiz。羌之住地，据初期史所知，系散布于印度西北及昆仑一带，意者伊兰人未进入今伊兰以前，其地本羌族之居，后乃被迫南徙，如是，则羌人习俗（最怪者如猪头）有时与西亚相类，易得说明。此外西方语言呼“城”为 kath 及 ganj，似无非同本一源。

《汉书》六九注，东汉服虔曰：“婼音兒，羌名也。”魏苏林（建安黄初时人）曰：“婼音兒遮反。”按古用直音，服氏之“兒”，殆只取近似者注之，我国无 r 收声字，惟遮、奢等略为相类，此“婼”字殆为 r 收声而音近于 yer 或 yar（据高本汉推测，上古兒字之发声为 n̄-，与 y 同位，故常可通转）。再合诸前文“羌”之为 kand，则中世以后出现之 Yarkand（叶尔羌），可能就是“婼羌”之原语。

要说明此两个名称之关系，先须了解西汉时代婼羌族之分布。依前引西域各传，小宛等五国均接婼羌，宋刘奉世因以为误；奉世

云：“按婼羌小国，最近阳关，去长安六千里耳，在都护之东，而此渠勒、于阗、难兜之类，去长安且万里，东北行数千里乃至都护，安得与婼羌相接？必误。”补注云：“按《通典》一八九曰，敦煌西（西）城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曰葱茈羌、白马羌、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盖同为羌种，故传以婼羌目之，刘氏以为误，非也。”又云：“戎卢、于阗、难兜三国皆云南接婼羌，而此（小宛）与渠勒独言东西者，盖小宛、渠勒二国所据之山谷近于南，其实羌包有南山，此亦当云南也。”丁谦考证衍其说，以为柴达木、郭斯特等处，皆其故地（白鸟库吉说略同）。余按《十三州志》云：“婼羌国滨带南山，西有葱岭，余种或虏或羌，户口甚多也。”（《寰宇记》一八一引）综前引各说，可知婼羌领域，实沿昆仑山脉以达印度西北，彼非城郭之国，故不举都城，本《传》所记，特其近汉之里数。申言之，旧日部落名称，随其势力消长，隐现无常，婼羌分布既如此辽阔，余裔以“叶尔羌”名称出现于新疆西南，实无足怪。

婼羌名称，在北魏时又有异译，考《周书》一七，“若干惠，代郡武川人，其先与魏氏俱起，以国为姓。”《元和姓纂》一〇云：“若干出自代北，以国为氏。”姓解二，若干之若“音惹”，《齐东野语》云，“若音人者反”，与前引之“兒遮反”无异。按《姓纂》之说，当本《周书》，武川不过后来定居之地，古未闻有“若干”国，而“若”之音恰与婼羌之“婼”同。又 Samarkand 一翻斜米思干，Tashkend 一翻塔什干。是若干即婼羌异译，尤征婼羌之原音等于 Yarkand 也。迄元已后，其名复渐著，然译写不一。《元史·世祖纪》作鸦儿看，《曷思麦里传》作押儿牵^①，《异域录》作伊尔钦或叶尔奇木，《清一统志》作叶尔羌，《明史·坤城传》作牙儿干^②，《水道提纲》作也勒七母，《西域水道记》作叶尔钦，清代改写作“羌”，盖不期而与古合。《西域闻见录》二云，“叶尔谓地。羌，宽广之谓”。白鸟库吉又谓“婼”为藏语之

盐(chha)③，对语原之解释，均未必可信。

今北印度之 Dard 族多为 Yeshkun 人，Biddulph 疑其与月氏同种；又乞托拉尔 (Chitral) 河一名 Yarkhun 河。Yeshkun 及 Yarkhun 皆可能是 Yarkand 之音转④，地复相邻。由此推之，大约昆仑山脉内外西至罽密 (Kashmir) 之东，为婼羌故墟，可无疑矣。（参看下一《乌耗校释》）

敦煌县在今东经九十五度弱，北纬四十度强，蒲昌海故址约在东经九十度迤东，斯文赫定曾于旧湖址之西北，发见楼兰故城遗迹，如依本《传》去阳关千八百里及不当孔道两文校之，则婼羌国应在今车尔成(即且末)之东或东南，靠近阿尔金塔克(Altyn Tagh) 山脉。所谓西北至鄯善，乃指其国境。又 Charkhlik (卡克里克) 有 Charchalyk 等几个拼法（参下《鄯善校释》），约当东经八十八度，汉时应属鄯善，清廷于此设婼羌县者误。

屈史蔑(Gutschmid)《波斯志》云：“巴克缺拉(Bactria)王国在欧息地摩司(Euthydemus)时颇为发达，其子地麦忒列司(Demetrius)逾印度高加索山，勘定印度；又败中国之鞚靼人，远及于色尔人(Seres)与封尼人(Phaunians)所居之地，自是而巴克缺拉希腊人之权力益张，又沿塔里木(Tarym)河觅与中国通商之道。盖色尔一种，先亦为中国人。封尼人之所居，据普林尼(Pliny)氏言，当在阿塔科里(Attacori)种人之西。阿塔科里为一种不可考之民族，居于黄河发源之处，与土加里(Tochari)种人之东；土加里之先，即居留于和阗之东者。据中国纪载，其地本为一西藏之努根游牧民族所据，巴克缺拉人因而占之。史家言自阿克苏河与叶克撒尔忒司(Yaxartes)河以攻鞚靼，服之甚易，但难守耳。按此，则巴克缺拉人之自此方向而进入此地也，可无疑矣。惜司忒拉保(Strabo)氏未言是役是否为地麦忒列司之事，巴克缺拉覆亡于纪元前一百七十七年之前”。按志文之努根，实“婼羌”之对译。Phaunians 或指西藏人，

亦未可定。Seres 原是欧人用以名中国，两汉时代西域属都护，外人东来者入石塔即视为中国境，又旧传于阗与汉人同种，故此名遂适用于于阗，冯承钧不审当日情况，漫据玉尔说以 Seres 比附疏勒^⑤，非也。

去胡来王，师古曰：“言去离胡戎来附汉也。”又《匈奴传》下，去胡来王唐兜，师古曰：“为其去胡而来降汉，故以为王号。”顾炎武云：“注非也，《西域传》，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按颜氏于西域、匈奴两传同作一解，非不知去胡来王即婼羌王也，特颜氏所释者义，顾氏所释者地，观点不同，安有是非？今须问“去胡来”三字是完全译音，抑完全取义，抑译音兼孕义耳？如属第一种，则颜释为非，属第二、三种，则颜释为是，未有佐证，是非莫决。惟以个人管窥，似近第三种也。考《史记》太初三年，响犁湖立为单于^⑥，《集解》云，“骃案（响）音钩，又音吁”，方壮猷释义为七世^⑦。吁去、犁来皆音转，或本作“去来胡王”，而学者因文生义，遂倒互其文耶？

徐松《补注》云：“《传》特于婼羌、楼兰两国，标去阳关、去长安，知阳关之去长安四千五百里。”此因 6300—1800 及 6100—1600 均等于四千五百里也。按《元和郡县志》四〇，沙州东南至上都三千七百里，寿昌县东至州一百五里，阳关在县西六里，合之阳关去长安只三千八百十一里，是汉、唐计里，相差乃至七百，此实因《汉书》误五千为六千耳（阳关去长安实只三千五百里）。

赤水羌，《隋书》二九云：“河源郡置在古赤水城，有曼头城。积石山，河流所出，有七乌海，统县二，达（一作远）化、赤水。”又六一云：“帝命（宇文）述以兵屯西平之临羌城，抚纳降附，吐谷浑见述拥强兵，惧不敢降，遂西遁。述追之，至曼头城。攻拔之，斩三千余级，乘胜至赤水城，复拔之。其余党走屯丘尼川，述进击大破之，浑主南走雪山。”《通典》一九〇吐谷浑云：“大城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理；其主理幕贺川。西有